



海外汉学丛书

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by Ronald Egan

美的焦虑

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

〔美〕艾朗诺 著

郭勉愈 校
杜斐然 刘鹏 潘玉涛 译

上海古籍出版社



海外汉学丛书

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by Ronald Egan

美的焦虑

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

〔美〕艾朗诺 著

杜斐然 刘鹏 潘玉涛 译

郭勉愈 校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 / (美) 艾朗诺著；杜斐然，刘鹏，潘玉涛译；郭勉愈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4

(海外汉学丛书)

ISBN 978 - 7 - 5325 - 6770 - 6

I. ①美… II. ①艾… ②杜… ③刘… ④潘… ⑤郭…
III. ①美学思想—研究—中国—北宋 IV. ①B83 - 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5760 号

海外汉学丛书

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

(美)艾朗诺 著

杜斐然 刘鹏 潘玉涛 译

郭勉愈 校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www.guji.com.cn

(2) E-mail：gujil@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 × 1092 1/18 印张 18 插页 3 字数 260,000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100

ISBN 978 - 7 - 5325 - 6770 - 6

I · 2659 定价：4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出版说明

上海古籍出版社一直关注海外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就出版了《海外红学论集》、《金瓶梅西方论文集》等著作，并与科学出版社合作出版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先生主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80年代后期，在著名学者王元化先生和海外著名汉学家的支持下，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了《海外汉学丛书》的出版计划，以集中展示海外汉学研究的成果。自1989年推出首批4种著作后，十年间这套丛书共推出20余种海外汉学名著，深受海内外学术界的好评。

《海外汉学丛书》包括来自美国、日本、法国、英国、加拿大和俄罗斯等各国著名汉学家的研究著述，涉及中国哲学、历史、文学、宗教、民俗、经济、科技等诸多方面。提倡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和富于创见的研究精神，是其宗旨，也是这套丛书入选的标准。因此，丛书入选著作中既有不少已有定评的堪称经典之作，又有一些当时新出的汉学研究力作。前者如日本学者小尾郊一的《中国文学中所表现的自然和自然观》、法国学者谢和耐的《中国和基督教》，后者以美国学者斯蒂芬·欧文（宇文所安）的《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为代表，这些著作虽然研究的角度和方法各有不同，但都对研究对象作了深入细微的考察和分析，体现出材料翔实和观点新颖的特点，为海内外学术界和知识界所借鉴。同时，译者也多为专业研究者，对原著多有心得之论，因此译本受到了海内外汉学界和读者的欢迎。

近十几年来，在中国研究的各个领域，中外学者的交流、对话日趋频繁而密切，中国学者对海外汉学成果的借鉴也日益及时而深

人，海外汉学既是中国高校的独立研究专业，又成为中国学人育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取资对象。新生代的海外汉学家也从专为本国读者写作，自觉地扩展到以华语阅读界为更广大的受众，其著作与中文学界相关著作开始出现话题互生共进的关系，预示了更广阔的学术谱系建立的可能。本世纪以来，虽然由于出版计划调整，《海外汉学丛书》一直未有新品推出，但上海古籍出版社仍然持续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海外汉学专题译丛，或从海外知名出版社直接引进汉学丛书如《剑桥中华文史丛刊》，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出版经验及资源。鉴于《海外汉学丛书》在海内外学术界曾产生过积极影响，上海古籍出版社听取学术界的意见，决定重新启动这套丛书，在推出新译的海外汉学名著的同时，也将部分已出版的重要海外汉学著作纳入这套丛书，集中品牌，以飨读者。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3月

鸣 谢

此书原名为 *The Problem of Beauty: Aesthetic Thought and Pursuit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China* , 2006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中文版书名“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是由本人与主要译者杜斐然斟酌确定的。第一章由潘玉涛译成中文后，经刘宁修润发表于她和朱刚主编的《思想史研究》第四辑——《欧阳修与宋代士大夫》。第二章和第三章由刘鹏译。后半部由杜斐然译，她当时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花了三年的课余时间把它译完。幸蒙上海古籍出版社决定出版，我多年的好友郭勉愈博士在北京把稿件从头仔细看了一遍，把前后风格或用词不一致处逐一修改；“引论”则是内子陈毓贤补译的。此书中文版得以面世，是多人努力的成果。谨此深深致谢！

目 录

鸣谢	1
引论	1
第一章 对古“迹”的再思考：欧阳修论石刻	4
第二章 新的诗歌批评：诗话的创造	45
第三章 牡丹的诱惑：有关植物的写作以及花卉的美	81
第四章 苏轼、王诜、米芾的艺术品收藏及其困扰	120
第五章 宋词：多情之恼	178
第六章 宋词：新的词评观念，新的男性声音	222
结论：社会阶层、市场与性别中的审美	259
征引书目	285
索引	299

引 论

此书论及北宋（960—1126），特别是1030年后的约100年间，士大夫群体在某些领域内对美的追求，以及他们相关的表述。这些领域包括艺术品的鉴赏与收藏（第一章和第四章），诗话（第二章），花谱（第三章），以及在这一时期极为风行的词（第五章和第六章）。

这不是一本涵盖北宋美学的书，但这些领域的发展呈现了北宋文化的特征，而北宋这方面的成就，对后来中国文化有深远的影响。因涉及的层面相当广，而不少议题又是以前很少有人关注的，我只能抓住比较重要和有代表性的文献处理，希望可藉以抛砖引玉。

11世纪左右，中国士大夫对美的追求空前的热烈，开拓了大片的新天地，但也因而造成新的焦虑。欧阳修之前，似乎没人留意散落在古庙、山林，以及墓碑上的铭文，他有系统地搜罗这些古字的拓片，包括无名之辈以及北方半开化民族的书法，将之视为艺术品收入《集古录》；他对这些拓片的讨论，引发的¹问题包括艺术天才分布如何，艺术鉴赏是否与儒家教化相抵触，这些疑问的提出，对士大夫的既有观念是具颠覆性的。

第一位写“诗话”的人亦是欧阳修，这种文体经欧阳修晚年开了头便快速广受仿效，可以说它马上成为中国人议论文学最重要的方式。值得注意的是，诗话提供了一个商榷诗歌技巧的平台，此种技术性的讨论在此之前很少，这也是文人对诗话特别青睐的原因。欧阳修于1034年写的《洛阳牡丹记》，开发了另一个知识领域。他提供这种植物各个品种的信息，谈论它的培植方法，描绘每年牡丹开花时洛阳市民欢腾的盛况。《洛阳牡丹记》出现后，其他文人便争先恐后撰文谈论他们所钟爱的花卉的品种、培植方法等。全世界最初

2 可观的花木培植和鉴赏文学，就这样在北宋末年的中国产生了。

本书第四章讨论欧阳修之后的下一代士大夫，即苏轼和米芾所处时代的书画收藏。这自然不是一种新的活动，因为中国收藏书画渊源已久，可是艺术家和鉴赏家乐此不疲地撰文谈论怎样甄识藏品优劣和他们收藏的经过，热烈地给艺术品划定等级，并探讨对艺术品有占有欲是否有损藏家的人格等等，都是空前的现象。同样地，词不是北宋方才兴起的文体，但在11世纪才发扬光大，充分发挥了它表达思想感情的潜力，它的文学地位也得以大幅提升，以致我们今天一谈到词就想到宋词，把二者画了等号，而且词被认为是宋代文学巅峰期的代表作。本书第五章和第六章追溯词如何在11世纪逐渐演变，在此期间文评家对它的态度如何从鄙夷转为认可。

我们要问，这些不同思想范畴的领域发展有何共通处？首先，欧阳修是个关键人物。他非但首创把石碑铭文的书法当艺术品收藏，撰写诗话和花谱，他对词的发展贡献也非常大。换句话说，这些不同领域曾被同一个人塑造，无论是创始或是改造的动力都是通过此人的生命迸发出来的，而他恰恰是一位这一时代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人，又是其后这些领域中领头人物的良师益友。我开始从事此项研究时，感到不妨假设这些不同领域的发展之间有关联，尽管这种关联在相关文献中并没有明白显示。

3

果然，这些领域的发展所牵涉的问题虽不同，但有些相似的现象不断浮现，这意味着北宋士大夫文化的发展轨迹有其内在的逻辑，也就是说，这一时代的文化创新反映了一群人连贯一致的趣味和选择。本书最后一章将比较详细地讨论这些选择，下面仅粗略谈谈。

北宋期间，士大夫对“美”的追求在不同的领域里都跨出以往的范围，冲破以往认为不可逾越的界限。比如欧阳修品鉴书法不再以王羲之、王献之的典范为准则，这使他不得不面对一个难题，即书法好的铭文题材若与儒家教化相悖，应当如何处置。牡丹花香艳诱人，不似松、竹、梅素淡高雅，向来不得士大夫青睐，却引起欧

阳修的兴趣。同样，北宋文人将五代宫廷词人所避忌的市民俗味引入词内，也是一种突破。11世纪末的诗话大谈赋诗填词的技术，这本为士大夫所不齿，但这种谈论发掘了不少怎样才是好诗词的见解。

总的说来，北宋末士大夫的精神内容和表达方式都扩宽了，以前被认为离经叛道的娱乐和各种对美的追求得以见容，而且可诉诸文字。在某方面，士大夫接纳了商人阶级的品味，市价成为鉴定艺术品的准则之一，无论谈的是一株牡丹花，一幅唐代的画，或一首名诗人的艳词。而一件古物值不值得保存，不再以狭窄的伦理教条为依据。 4

对美积极的追求，出人意表地影响了男性的自我定位。词的感伤、技巧的研磨、花木的培植、精致艺术品的鉴赏，都有浓厚的女性气息。这些新风尚导致北宋士大夫调整了他们对于怎样才算男子汉的观念。

本书把焦点集中于北宋士大夫在追求美的过程中所面临的难题，指出传统儒家对这些活动有许多成见，他们必须开辟新的视野，敢于挣脱教条的束缚，勉力给出一个说法以自辩。事实上，他们努力的成果是辉煌夺目而影响深远的。 5

第一章 对古“迹”的再思考：欧阳修论石刻

欧阳修收集过大量石刻拓片，这是宋代古器物收藏的重要成果之一。欧阳修将 1500 多年间的石刻文本聚集到一起，这激发了人们对古代石刻及其书法的新兴趣，由此刺激其他收藏者将注意力转向别种艺术品和古器物，尤其是青铜彝器。然而，欧阳修并不只是要成为一个收藏家，并不满足于聚集大批的石刻拓片。他还对收集的铭文多有评论，评论其内容及艺术魅力。欧阳修收集的有些铭文，堪称书法典范，它们是艺术品，是文化史的遗迹，其内容有时会惹人争议，而欧阳修探索其意蕴，他的思考常常很个性化。他针对这些铭文所写的跋尾，表明他一直在努力重新揣摩那存留在几世纪之前的人们的笔迹中的美^①。

欧阳修收集金石铭文这项工作的基本情况，可以简要概括如下：1044 年范仲淹倡导的改革运动失败后，欧阳修被逐出京城，贬官至北方诸路，首先是北都大名府，随后在 1045 年更北至边境真定府。他对铭文的兴趣由来已久，确切地说，至少始于早年在洛阳与同道

① 关于宋代金石学这一大主题，一般性的研究还没有出现在英文文章中，不过关于欧阳修的收集工作，在一些具体方面已有所讨论，如倪雅梅（Amy McNair）在颜真卿对宋代书法典范的影响问题上有着杰出研究，可参见其论著《心正笔正：颜真卿书法与宋代文人政治》（*The Upright Brush: Yan Zhenqing's Calligraphy and Song Literati Politics*），尤其是第一章和第七章。关于欧阳修的一般性研究，参看刘子健（James T. C. Liu）《欧阳修：11 世纪的新儒家》（*Ouyang Hsiu: An Eleventh Century Neo-Confucianist*），以及拙作《欧阳修的文学作品》（*Literary Works of Ou-yang Hsiu (1007—1072)*）。关于欧阳修在北宋文化史和士大夫历史上的地位，参看包弼德（Peter K. Bol）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al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第 176—201 页。关于欧阳修对《诗经》的研究，及其对传统和文学表达的思考，参看范佐仁（Steven Van Zoeren）《诗与人格：中国传统的阅读、注释与阐释》（*Poetry and Personality: Reading, Exegesis, and Hermeneutics in Traditional China*）第六章。

编者按：本书原注所引各书版本请参书后“征引书目”。

学者交往时。当时，他们正在推动古文复兴，而这样的古文在石刻中有所保存。自 1030 年代起，他已经不时地在收集碑刻拓片^②。如今在遥远的北方，没什么消遣，欧阳修决定系统收集他所能获得的一切古代拓片^③。一旦开始，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不会忘记这项工作，前后持续了近 20 年，最终收集到总计 1000 多件拓片。他曾一一列出朋友们的帮助，这些朋友，随着职官任命，迁徙于帝国各地，经常会到一些欧阳修从未到过的遥远地方，在那里他们设法弄到当地的碑刻拓片，转寄给欧阳修。一些朋友自己也是收藏家（比如刘敞，他提供给欧阳修几件出土于洛阳的古代器物的拓片）。但是欧阳修的拓片集——他称之为《集古录》，使所有同时代的其他类似藏品集都黯然失色。他告诉我们，由于担心转写中会引入谬误，他没有将铭文抄写入《集古录》，而是将拓片进行装裱，捆起来，装订成厚厚的卷册。

8

1062 年，欧阳修为正在写以及计划写的铭文跋尾写了序，这些跋尾，他准备单独汇编成集。这篇序正式表述了他的工作意图。此后，他便致力于为几占其藏品一半的 400 多件铭文撰写跋尾，作学术笔记，直到 1072 年去世。欧阳修晚年将其藏品及跋尾托付其子欧阳棐。欧阳棐很可能按年代对之作了编排（始于周代，止于唐五代），因为欧阳修的藏品原本并非按铭文年代编排，而是按获得的时间顺序。重新编排后的跋尾，名为《集古录跋尾》，共 10 卷，在南宋被编入他的文集里，今天仍保留其中^④。欧阳棐增加了一个录目，

② 参看欧阳修的跋尾《晋南乡太守颂》（《集古录跋尾》卷四，《欧阳修全集》，第 2159 页）、《唐吕谭表》（《集古录跋尾》卷七，《欧阳修全集》，第 2236 页）。严杰：《欧阳修年谱》，第 135 页。

③ 欧阳修自述如何开始其收集工作，见于他给蔡襄的一封信（参第 14 页引文）：《与蔡君谟求书集古录日序书》（《居士外集》卷二〇，《欧阳修全集》，第 1022—1023 页），及《魏刘熹学生冢碑》（《居士外集》卷四，《欧阳修全集》，第 2155 页）。关于这期间欧阳修生平的编年叙述，参看胡柯《欧阳修年谱》（《欧阳修全集》，第 2602—2604 页附录一）和严杰《欧阳修年谱》第 124—135 页。

④ 此处依新近出版的《欧阳修全集》卷一三四至一四三所收跋尾。

也分 10 卷。他列出了每一件铭文的标题，并简要标明其作者、书写者和时代（如可知）^⑤。录目在南宋时亡佚，不过清人通过辑佚部分得以复原^⑥。依据欧阳修的跋尾和欧阳棐的录目，我们现在获知欧阳修收集品中 700 多件铭文的标题。但是就铭文本身来说，清代学者缪荃孙估计，清代留存的已不足原来的十分之一^⑦。

欧阳修的跋尾长短很不一致。最简略的只有数十个字，简要地介绍了铭文的出处和内容。不过，内容简略的跋尾相对不多，毕竟，欧阳修写作大多数跋尾的目的，是要特别点评其手边铭文中的某些内容。他会关注铭文提到的历史事件，评论其书法，或者探讨作者生平或个性的某个方面。其跋尾经常达到一定的长度——最长的一条有几百字，以表达其见解。最近出版的《欧阳修全集》（全六册）中，《集古录跋尾》占到 266 页^⑧。正是这些学术笔记使欧阳修成为中国金石学的开山。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对欧阳修的工作有了初步了解。欧阳修的收集具有某种历史意义，因为就像他反复告诉我们的，那是件不寻常的工作。但是，对今人来说，他如此大规模地记录所收集的铭文这件事本身，才更不寻常、更有意味。与欧阳修同时，还有其他拓片和古器物的收集者，但没人如此广泛、如此费神地记录其收集品。欧阳修的跋尾有大量内容思考往昔，思考书法在文化史上的角色。经过十年的写作，这些跋尾包含了他对所获铭文的思索，角度众多，感情丰富。他是历史学家，是文物研究者，是伦理学者，是鉴赏家，是艺术评论家，是哲学家，是诗人。简言之，这些跋尾揭示了他对其藏品的复杂态度。

⑤ 参见欧阳棐《录日记》（《集古录跋尾》附录卷一，第 2325 页）和欧阳修文集的南宋编者的论述（附录卷二，第 2326 页）。

⑥ 欧阳棐《集古录目》，缪荃孙辑。

⑦ 缪荃孙《跋》（欧阳棐《集古录目》）。

⑧ 欧阳修《集古录跋尾》，《欧阳修全集》卷一三四至一四三，第 2061—2327 页。

欧阳修的序

这里，我们先来看欧阳修的序，这篇序是他为所收集铭文的数百篇跋尾而作的，经常被收入选本，并被认为是欧阳修对自己工作的权威性说明。

集古录目序^⑨

物常聚于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强。有力而不好，好之而无力，虽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蛮夷山海杀人之兽，然其齿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昆仑流沙万里之外，经十余译乃至乎中国。珠出南海，常生深渊，采者腰绠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则下饱蛟鱼。金矿于山，凿深而穴远，篝火糗粮而后进，其崖崩窟塞，则遂葬于其中者，率常数十百人。其远且难，而又多死祸，常如此。然而金玉珠玑，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则无不至也。

汤盘、孔鼎、岐阳之鼓、岱山、邹峰、会稽之刻石，与夫汉魏以来圣君贤士桓碑、彝器、铭诗、序记，下至古文、籀篆、11分隶诸家之字书，皆三代以来至宝，怪奇伟丽、工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远，其取之无祸。然而风霜兵火，湮沦磨灭，散弃于山崖墟莽之间未尝收拾者，由世之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仅得其一二，而不能使其聚也。

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颛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贪者，皆无欲于其间，故得其一其所好于斯。好之已笃，则力虽未足，犹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来，下更秦、汉、隋、唐、五代，外至

^⑨ 欧阳修《集古录目序》（《居士集》卷四二，《欧阳修全集》，第599—600页）。和欧集的南宋编者一样，我将标题中的“目”理解为“跋尾”，欧阳修对铭文所做的笔记在后代也如此被称呼。

四海九州，名山大泽，穷崖绝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诡怪所传，莫不皆有，以为《集古录》。以谓转写失真，故因其石本，轴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无时世之先后，盖其取多而未已，故随其所得而录之。又以谓聚多而终必散，乃撮其大要，别为录目，因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

12 或讥予曰：物多则其势难聚，聚久而无不散，何必区区于是哉？予对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⑩

这篇序的几个要点值得说明一下。欧阳修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所有种类的石刻都受到冷落。世人根本不关心石刻，一旦被树立在那里，就一任其湮沦，直到丢失、磨灭和被毁。与此同时，像富人那种对待珍宝及其他财富所拥有的嗜好，却为整个社会所汲汲不舍。欧阳修的语气明显有些情绪化。而且，即使考虑到这里有修辞的夸大，他对时人淡漠于古代石刻的描述还是让我们惊讶。我们以为，宋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重视历史及其遗迹——这甚至是整个中国文化的特征——这认识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欧阳修所说的这种冷漠，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考虑到书法在中国人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听到有人说人们对镌有文字的古器物普遍漠不关心，尤其让人震惊。我们想到的是古代铭刻在后世如何受到重视，是那些拓片集甚至石碑本身如何有名（比如现在西安的碑林，就是在欧阳修身后十年左右开始建立的）。

目前已知，北宋的几位皇帝助长了宫廷中青铜器收藏和编目的风气，其中很多青铜器是有铭文的。第二位皇帝太宗（976—997年在位）从事过类似的收藏，仁宗更加热衷于此^⑪，其漫长的在位

^⑩ 欧阳修《集古录目序》，《居士集》卷四二，《欧阳修全集》，第599页。

^⑪ 参看张临生《北宋皇室青铜礼器的收藏》（未刊稿），台湾大学“跨文化视阈下的比较宫廷文化研讨会”会议论文（台北：1997年8月25日至27日）。

(1023—1063)正与欧阳修的收集时间相吻合。前代帝王无疑也热衷于此。毕竟，皇室朝廷特别乐意说自己精于古代礼乐，这种精通可以营造氛围，有力地证明政权的合法性。占有并保存古代的青铜器是精于礼乐的象征。北宋末的徽宗皇帝（1101—1126年在位）将这种皇室传统趣味发展到极致，他聚敛的古代青铜器之多，为中国历史所仅见。 13

欧阳修的做法和兴趣同皇室截然不同。他并不热衷于收藏器物，除了很少的几件。皇室搜集青铜器，目的之一是为了证明其正统性，欧阳修完全没有这种别有用心 的动机。此外，欧阳修说只有他对遍布帝国旷野、寺庙和高山的石刻感兴趣。尽管这乍一听不太可信，但大致还是实情。至少就我们所知，欧阳修是自古以来第一个决心广泛收集拓片的人，显然也是第一个如此详细记录其铭文藏品的人。在欧阳修之后，甚至是紧接着，就出现了许多私人收藏家。他自己也说，正是因为他作为铭文收集者，为世人做了个榜样，人们才开始重视它们^⑫。这听上去不无夸大之嫌，但是有其他的宋代资料证实了这一说法。朱熹（1130—1200）肯定欧阳修的功绩说：“集录金石，于古初无，盖自欧阳文忠公始。”^⑬有这样想法的人并不止他一个。

欧阳修在序中特意强调的一点，是其藏品的包容性。第三段一开始就按时代先后罗列了一长串可以得到的各种铭文。第四段又有罗列，首先是藏品反映的朝代，其次是获取拓片的地点。穷尽罗列的最后是他自豪地宣称自己“莫不皆有”。序言中也提到其藏品包括古代“圣君贤士”的手迹，但是我们注意到他并没强调这一点。事实上，拓片的绝大部分不是出自古代贤达，因为欧阳修决定收集易于获得的拓片，其大宗因而也就出自那些声名不显之辈或无 14

⑫ 欧阳修《后汉樊常侍碑》，《集古录跋尾》卷二，《欧阳修全集》，第2109页。

⑬ 朱熹《题欧公金石录序真迹》，《朱熹集》卷八二，《欧阳修全集》，第4214页。

名之士。

欧阳修藏品的包容性，使其有别于另一种收藏古代书法作品的方法，这种方法通常由帝王采用。欧阳修的主要收集目的是欣赏其书法，因此他并不要编法帖目录。他的眼界开阔得多，不像鉴赏家只盯着那些杰作、那些堪为后代之楷式的作品。宋代开国伊始就开始了这样的收集。在太宗的授意下，10世纪90年代，朝廷百官搜集了被认为是现存最好的书法手迹，藏于宫廷中。这些被称为《淳化阁法帖》，因保存于淳化阁而得名。这次汇集以经典传统的书法作品为重，尤其是晋代（4世纪）大家王羲之和王献之，以及与之风格相类的其他书法家的作品，它们多半保存在私人短筒手迹的摹本之中。这些作品被上板印刷，副本分赐给达官显贵¹⁴。

15 《淳化阁法帖》在欧阳修时代很有名，虽然分赐的传统已经中止（当时风传印版已毁于宫火），但私藏印本流通广泛，欧阳修应该见过。在他之后，《法帖》遭到了米芾等人的强烈批评，因为它收入了很多张冠李戴的作品。欧阳修自己在谈到《法帖》的时候比较克制，但他也毫不犹豫地公开反对将“二王”神圣化，反对先入为主地盲目摹拟其风格¹⁵。

尽管欧阳修不常提及，但在他自己的收集过程中，《淳化阁法帖》在他心中的分量一定很重。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收集展现了数世纪前的书法作品的另一面。二者的区别可以用各自标题中的两个词概括：法与古。太宗的汇编，所选作品年代是否久远并非最紧要，毕竟，其用意在于提供一种典范。欧阳修则不然，他收集的作品的

¹⁴ 关于《淳化阁法帖》，参看倪雅梅（Amy McNair）《宋代的简札法帖集》（“The Engraved Model-Letters Compendia of the Song Dynast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4.2（1994）：pp. 209—225。

¹⁵ 欧阳修《学书自成家说》、《笔说》，《欧阳修全集》卷一二九，第1968页，以及《晋王献之法帖》，《集古录跋尾》卷四，《欧阳修全集》第2164页。参看拙作《欧阳修与苏轼论书法》（Ou-yang Hsiu and Su Shih on Calligraphy）一文关于欧阳修对待法帖和“二王”风格的态度论述。